

• 中国中青年经济学家论著 •

ZHONGGUO ZHONGQINGNIAN
JINGJIXUEJIA LUNZHU

经济决策论

王大成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经 济 决 策 论

王大成 著

中 国 经 济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从理论上阐述了经济决策在宏观经济、微观经济以及其它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从哲学的角度并运用数学方法,对如何进行正确的经济决策,分别予以定性的分析和定量的论证,详细介绍了经济决策的概念、方向、标准、程序和一些经济管理的新思想、新方法。同时,提出了作为一个经济决策者所应具备的品质、修养和风度,以及如何使经济决策逐步走向科学化的根本途径。

本书观点新颖、语言流畅,是一本有一定学术水平的理论专著,对广大经济理论工作者、各级企业领导干部、大专院校经济专业的师生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责任编辑: 栾建民 韩吟

封面设计: 王乃晋

经 济 决 策 论

王大成 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翠微路22号)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1/32 6印张 155千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

ISBN 7-5017-0139-3 F·198

定价: 2.90元

前 言

决策，包括政治决策、经济决策、军事决策等，影响深远，至关重要，历来为人们所关注。但是，与政治决策、军事决策的研究相比，对经济决策的研究，无论在力量和著作的数量方面，都略显不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本最主要的实践活动。因此，以研究如何正确决定和指导这种活动为任务的经济决策学则应占有突出的地位。

建国以来，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从一定意义上说，主要是经济决策正确的结果。毋庸讳言，我们远未取得应有的更大的成就，除了政治原因之外，也应归结于经济决策失误，特别是某些重大的失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英明地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工作中心。这就为经济决策开辟了广阔的用武之地，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一个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经济技术落后的国家尽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如何充分利用对外开放政策和有利的国际条件，尽快把我国的经济搞上去，使我国重新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如何卓有成效地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特别是在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等等，都亟待经济决策予以回答。

1982年我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曾以《试论科学的经济决策》为题撰写了硕士论文。现在奉献给读者的小册子就是在那篇论文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五年过去了，我虽然在经济决策科学化问题上未有更深的研究，但是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

必须从维系国家富强、民族兴旺、人民幸福这样一个战略高度

来认识经济决策，对它的科学化要有责任感、紧迫感；

必须通过发展教育、强化法制、发扬民主这三个根本途径来提高经济决策科学化的程度，没有教育、法制和民主，不可能有科学的经济决策；

必须把努力提高领导人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思想作风同充分发挥群众和专家的集体智慧结合起来，这是做好经济决策的基本内力，缺一不可；

必须把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同自然科学知识和现代化技术手段结合起来，相得益彰，使经济决策从经验走向科学。

我力图把这些思想写进这本书中，但是由于水平所限，很可能有论述不足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大成，副研究员，河南省沈丘县人，1945年生。1982年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近几年曾在报刊上发表40多篇文章，並与人合著《企业素质概论》一书。现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生产调度局生产处处长。

243 7/07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经济决策的地位	(1)
第一节 历史的回顾.....	(1)
第二节 理论的思考.....	(11)
第三节 我国的经验和教训.....	(16)
第二章 经济决策的概念	(31)
第一节 从经验走向科学.....	(31)
第二节 宏观经济决策.....	(38)
第三节 微观经济决策.....	(49)
第三章 经济决策的方向	(61)
第一节 基本标准.....	(61)
第二节 指导思想.....	(74)
第四章 决策程序	(85)
第一节 确定目标.....	(86)
第二节 设计方案.....	(93)
第三节 择优与修正.....	(101)
第五章 决策方法	(105)
第一节 软技术.....	(105)
第二节 硬技术.....	(109)
第六章 决策者的修养	(115)
第一节 思想政治修养.....	(115)
第二节 专业修养.....	(132)
第三节 作风修养.....	(140)

第七章 决策与智囊.....	(154)
第一节 重要工具.....	(154)
第二节 发挥作用.....	(162)
第八章 决策与教育、法制.....	(173)
第一节 教育是决策之本.....	(173)
第二节 强化法制对决策的影响.....	(179)

第一章 经济决策的地位

第一节 历史的回顾

古往今来，人们无不怀着敬慕和赞叹的心情，讴歌、传诵那些“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军事家、政治家。这说明，人们对于英明的决策是多么向往，多么重视！

的确，重大的军事决策和政治决策，不但对个人和集体，而且对国家和民族，乃至全全世界，都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历史上美国的“南北战争”和苏联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9世纪60年代，美国北部新兴的资本主义工业集团同南部种植园主所维护的奴隶制产生尖锐的矛盾，爆发了波及全国的“南北战争”。战争初期，北部工业资本集团由于实力不足，连连失利。1862年9月22日，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联邦政府总统林肯颁布了著名的《解放黑奴宣言》。《宣言》规定自1863年1月1日起，南方各州的黑人成为自由人。由于《宣言》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黑人工人、农民、士兵的热烈拥护，因而战争形势急转直下。北部工业资本集团的势力迅速壮大，屡屡取得军事胜利，并且终于在1865年迫使南部联军统帅投降。“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它彻底打跨了落后、反动的奴隶制度，为资本主义在美国蓬勃发展扫清了道路。

斯大林格勒大会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德国法西斯侵略军的决定性战役。1942年7月，德军向斯大林格勒发动猛烈进攻，先后使用了150多万兵力，企图占领该城，切断伏尔加河，控制高加索地区，然后北攻莫斯科。面对来势汹汹的强大敌人，无产阶级政治

家、军事家斯大林并没有惊慌失措，他经过深思熟虑，作出英明的决策：先防御后进攻，先围困后消灭。按照斯大林和苏联最高统帅部的部署，苏军以3个方面军的兵力和广大人民一起进行艰苦奋战，在顽强的防御中消灭了大量敌人。1942年11月，苏军转入反攻，包围33万德军达两个月之久，1943年2月将德军全部消灭。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有力地阻止了德军战略进攻的态势。毛泽东同志说：“这一战，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①

军事决策、政治决策事关全局，地位重要，已被人们所认识。其实，经济决策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最初僻处西隅，并不强大。后来，秦孝公任用商鞅，两度变法，使秦国国富民强，很快成为战国“七雄”之首。最后它又“远交近攻”，兼并六国，由秦始皇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商鞅变法”，实质上是通过大量的经济决策促进当时生产力的发展。例如，它的崇本（耕织）抑末政策规定，对于生产粟帛超过一定数量的农民可以减免徭役，而对投机倒把的商贾和游手好闲的贫民连同他们的妻子则一律收入官府做奴婢。这就鼓励了农民勤耕多织发展生产的积极性，限制和打击了商贾等不劳而获者的剥削行为，显然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19世纪中叶，当英、法等国早已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正处于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过渡的时候，东方的日本却依然还是一个停滞、落后的军事封建锁国。但是，由于日本从1868年至1912年成功地实行了“明治维新”，很快就赶上来了。它以40年的时间完成了英、法等国用100—200年的时间才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跳跃式地跻身于世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

日本的“明治维新”虽然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纲领为旗帜，但其核心是发展经济。经济决策在“明治维新”中居于显要位置，起着决定性作用。比如，“明治维新”时，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41页。

政府一方面以种种形式大批发放“创业基金”、“劝业基金”，帮助封建主开办银行，经营工商业，使他们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又以廉价“处理”的方式，把大部分国营企业卖给资本家，使他们的资本越来越雄厚。这种自上而下地扶植私人资本、加速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的做法，对于缩短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时间起了决定性作用。

以上只是简单地提及经济决策在古代的秦国和近代的日本由弱变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如果考察一下战后日本和联邦德国是如何通过卓有成效的经济决策实现经济起飞的，那么我们会更加坚信经济决策的极端重要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丧失了45%的国民财富和将近一半的工业交通设备。1946年工矿业生产仅及战前1935年的26.4%，钢产量由1943年的785万吨下降到1945年的56万吨，整个经济陷于瘫痪和崩溃。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在《日本列岛改造论》一书中写道：

“战后一段时间里，大多数国民衣衫褴褛，勒紧裤带，忍受着当时的艰苦生活，……制造飞机、坦克等武器的工厂，也都靠生产锅子、铲子、锄、锹勉强糊口。”

面对一片废墟，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经济决策。概括起来，有五个方面。

一、充分利用国际条件

日本是战败国。根据国际条约和日本宪法的规定，日本不能拥有大规模的军队，它的安全置于美国的保护之下。因此，日本每年的军费开支较少，只占它财政支出的5~7%，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般在20~40%之间。从数额上看，日本每年的军费只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政府抓住这个特殊的条件，集中财力，发展经济。一方面，政府每年拿出一半的财政支出用于直接投资，搞好运输、通讯等基础设施，为工业高速增长创造条件。另一方面，政府直接向私人企业提供长期优惠贷款，向私人银行提供资金，直接和间接

地促进工业发展。在日本重化工发展中起关键作用的动力工业、海洋运输业和机器制造业，基本上都是靠政府贷款发展起来的。

日本充分利用国际条件还表现在它不失时机地利用了美国侵略、侵越期间对它的援助和军需订货。侵略战争期间，美国为了减少运输，把日本变成了军火加工厂。1950~1953年，日本为美国提供了24.7亿美元的军火、器材和给养，不但刺激了本国的工业生产，而且从中获得大量外汇，进口许多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60年代美国发动侵略越南战争，情况也是如此。

二、正确地确立了“加工贸易立国”的方针

日本是个矿产资源极端贫乏的国家。据日本政府1971年10月发表的《资源白皮书》统计，日本10种主要资源（石油、天然气、铁矿石、原煤、铜、铝、锌、铅、镍、木材）依赖外国进口的比重，1960年为71%，1965年为81.4%，1970年为90%。1977年统计，进口比重又进一步上升，其中铜96.9%、石油99.7%、铝土矿100%。矿产资源不足使日本经济造成了“先天不足”，但是它并未束手待毙，而是千方百计地寻求发展。50年代日本确立了“加工贸易立国”的方针，即进口国外的原材料和能源，经过加工，再出口外销。这种战略，不但挽救了日本，而且振兴了日本，获得极大的成功。

1955~1970年，日本通过商品出口共创外汇1143亿美元。这期间，日本从国外进口850亿美元的原材料和130亿美元的机械设备，还引进23亿美元的先进技术，共花外汇1003亿美元。所有这些外汇都由外贸收入支付，仍有140亿美元的盈余。1985年，日本外贸出口达1756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2位。与此同时，日本的经济实力也大为增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接近美国。一个资源贫乏的小国，竟能取得如此惊人的发展，不能说不与确立“加工贸易立国”方针有密切关系。现在，日本又根据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提出“技术立国”的方针。可以相信，这个方针也将给日本带

来繁荣。

三、不断制定和推行科学的中长期发展计划

制定科学的、切实可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从而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心,夺取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已被许多国家的成功经验所肯定。日本在这方面做得尤其出色。战后初期,日本政府采取“倾斜生产方式”,优先发展煤炭、钢铁、运输等部门,从而完成了经济恢复。1955年以后,为了经济振兴,政府又根据不同时期的条件和任务,先后推行了9个中长期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划。如:“经济自立五年计划”(1956~1960年)、“新长期经济计划”(1958~1962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1970年)、“经济社会发展计划”(1967~1971年)、“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1970~1975年)、“新经济社会七年计划”(1979—1985年)等。这些计划充分考虑了需要与可能、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定得比较切合实际,因而大部分都被提前或超额完成了。其中,以“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作用最为显著。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日本政府根据著名经济学家下村治的建议,召集各大财团于1960年12月制定的。计划的制定者意识到日本的基础工业经过50年代的发展已具有带动整个经济“起飞”的条件;分析了日本在科学技术方面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的相当差距,认为它能够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来加快本国的经济发展;预见到在计划期内国际贸易的良好前景有利于日本这个加工贸易国家的经济增长;同时又考虑到当时人民群众强烈要求改善生活水平的政治形势。于是,“倍增计划”明确提出:“10年后我国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收入为20.8万日元,约达到现在二倍的水平。”“工资增长的情况,若按人口平均来看,则目标年份是基础年份的1.94倍。”实现目标的措施是:(1)充实社会资本;(2)改进产业结构;(3)促进对外贸易与国际经济的合作;(4)培训人才与振兴科学技术;(5)确保社会安定。执行结果,“倍增计划”提前完成

了。计划平均每年经济递增7.2%，实际递增10.6%；钢产量从1960年的2213万吨猛增到1970年的9332万吨，10年间增长了3倍；同期，汽车从47万辆增加到520万辆，增长了将近10倍；人民生活大幅度提高，整个经济接近了现代化水平。

四、广泛吸收国外的资金和先进技术

1950～1970年，日本共引进国外资本126亿美元，其中67亿美元来自国外借款，59亿美元是外国证券投资。这些资金对于日本的发展，具有巨大意义。所以田中角荣在《大臣日记》里说：“战后日本经济能够完成惊人的复兴，外国资本起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日本还不断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1950～1975年，日本先后从美国、西欧和苏联等40多个国家与地区引进了2577项先进技术，只用60亿美元的代价便获得了世界上几十个国家用半个多世纪、花费200多亿美元所取得的技术成果。

由于日本重视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所以，尽管它没有象美国、苏联那样大搞基础科学的研究，但是科学技术在经济中的应用却非常显著。例如，在冶金工业方面，日本不仅钢产量居世界前列（1984年10559万吨，仅次于苏联，居世界第2位），而且在高炉容积、氧气顶吹转炉炼钢率、吨钢综合能源消耗、连续铸钢等方面，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另外，日本的汽车、电子、造船等行业的技术水平更被人们交口称誉。

五、注意运用法律手段促进经济的发展

无论经济恢复时期还是经济振兴时期，日本政府都非常重视法律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早在1956年，为了发展机械工业，政府就公布了“振兴机械工业临时措置法”和92个与之相配合的有关法令，规定机械工业必须实现生产专业化和技术现代化。国家对19种重要产品作为“特定机械”，在财政金融方面予以优待。还规定，要强制加速设备更新，凡使用20年以上的机床必须拆除，使用15—20年

的机床拆除一半，加工精度达不到标准的机床全部报废，报废的机床由政府给予补贴。1961年，日本又制定了“农业基本法”，对农产品生产的合理化和农业技术的现代化起了巨大作用。现在，日本共有1.1万多个法律、法令和法规，其中绝大部分是经济立法。

总之，战后日本政府由于在上述几个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经济决策，使日本经济不但很快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而且保持了长达2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大约在1973年前后，日本实现了经济现代化。1950~1970年，日本的工业生产增长了15.7倍，平均每年增长14.1%。这个速度几乎超过联邦德国的1倍，为法国的2.4倍、美国的3.7倍、英国的5.7倍。1950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不仅低于英、法，而且少于印度，占资本主义世界第7位。可是到1977年已达5887亿美元，仅次于美、苏，居世界第3位。而且在许多工艺、技术和工业产品的产量、质量方面，处于世界先进地位。例如，1973年日本已有5种产品（船舶、收音机、电视机、铝、人造纤维）的产量居世界第1位，有6种产品（水泥、橡胶、小汽车、卡车、合成纤维、棉纱）产量占世界第2位。整个工业占资本主义世界的比重，由1960年的4.8%上升到1970年的9.5%。

让我们再看看联邦德国的例子。

联邦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与日本差不多。由于战败，德国几乎丧失了全部的国外市场和国外投资，国内的工业设备也遭到严重破坏。1946年德国西部（即后来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工业生产只及战前1938年的22.9%，同期钢产量只及11.3%。通货膨胀、财政拮据，再加上有500万复员军人和大批居民急待安置、救济，整个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的境地。

面对这种情况，联邦德国政府研究了各种对策。最后认为，控制货币流量是稳定金融、发展生产、扭转局面的关键。于是决定实行重大的币制改革。这项改革在美、英、法三国的支持下，于1948年6月开始实行。改革规定：旧马克和盟军发行的钞票一律禁止流通；冻结所有的银行存款；100旧马克只能兑换6.5新马克，而且每

人每天只能兑换新币40马克，其余的钱都要存入银行，等等。这一改革，结束了金融领域的混乱状况，使联邦德国渡过了财政困难。同时，也使那些宁肯囤积物资而不愿多持货币的私人企业，得以保持大量的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从而有利于发展生产。自从币制改革以后，联邦德国的经济明显好转，1952年就已经恢复到战前1938年的水平，之后又有新的发展。1971年联邦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比1951年增加了5倍多。1978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0300美元，超过美国、日本、苏联，居世界第8位，居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第1位。

经济决策不仅仅对国家和民族的荣衰至关重要，而且对企业 and 个人的成败也影响甚大。纵观当今的大企业家、大经营家，无不是靠决策的阶梯而发展起来的。

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哈默可谓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虽然已经年近9旬，仍旧来往于世界各地做生意，其中包括与中国合资开采山西平朔煤矿。他18岁当药厂的老板，以后的70年，依靠精明的决策，开创了许多业绩。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时候，许多药厂认为由于军方和政府取消了合同，一定会导致制药业萧条。哈默却预见到战争一旦结束，战时药品配给制就会取消，公众中一定掀起购买药品的热潮，药品价格不但不会下降，甚至还可能上涨。所以，当其他药厂大批裁员的时候，哈默却增加人员和扩大药房。结果形势的发展正如哈默所预料，他因此发了一大笔财。20年代初，列宁领导的年轻苏维埃国家处于饥饿、战争的交迫之中。人们把到苏联经商、投资办企业称作“到月球去探险”。然而哈默却第一个踏上这块“可怕的”土地。在苏联，他用粮食换取贵重的毛皮、白金、绿宝石、艺术珍品，还开办了工厂，10年间至少获利1000万美元。1956年，哈默已经58岁，但是他仍然壮心不已。在西方石油公司处于风雨飘摇之际，他毅然投资巨额，从事石油行业的冒险。这次决策使他日后成了亿万富翁。

再看一下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电讯公司——美国贝尔电话公司的发迹秘密。

电话系统应该私营，这在今天的美国是理所当然的。可是本世纪初，却不完全是这样。贝尔电话公司的总裁费尔为保持公司私营而不被政府收为“国营”，曾作出四项重要决策并得以成功：（1）费尔认为，私营企业只有比政府办的“国营”企业更能满足社会需求才能站得住脚。因此他提出“本公司以服务为目的”的口号，并采取了相应的组织措施。（2）费尔认为，一个全国性的电讯企业绝不能按传统的“自由企业”的观念，办成无拘无束的企业，否则就难免被政府接管。于是他提出“公众管制”的原则和办法。（3）费尔认为，一个独占性的企业虽然没有对手，但是，为了发展应该加强科学研究，“以明天为对手”。于是他创办了一个富有开创性研究特点的研究所（亦叫贝尔实验室，先后有7人获得诺贝尔奖金）。（4）费尔认为，许多企业之所以被政府收购，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资金。于是费尔打破从金融机构贷款的惯例，着眼于社会大众，特别是着眼于当时新兴起的“沙莉姑妈”阶层即中产阶级主妇阶层，根据她们拥有游资但经不起风险的特点，发明了一种独特的既有股息又能得到保障的贝尔股票。贝尔公司通过这种渠道集中了大量资金。费尔的这些决策今天看来未必有多大的仿效意义，但是他那种善于求生存、求发展的精神与智慧却值得我们学习和深思。关于这一点，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经验会从另一个侧面给我们以启发。

福特公司是目前美国汽车制造业中仅次于通用汽车公司的第二大公司，每年生产200多万辆各种型号的汽车，资产达200多亿美元。

1903年，公司老板亨利·福特在自己两次创办汽车事业均告失败之后，聘请了比自己懂技术懂管理的专家詹姆斯·库兹恩斯出任经理。库兹恩斯上任之后立即采取了三项重大决策：（1）进行广泛的市场调查和预测，得出只有生产出价廉、物美、耐用的产品才能打开销路的结论，于是制定出一辆汽车售价500美元的奋斗目标；（2）采用当时军事工业所惯用的流水装配工艺，使一辆汽车的装配时间由12小时28分钟缩短为9分钟，劳动生产率提高了80多倍，